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10119

· 问题研究 ·

中国农产品贸易角色变迁:1949—2019^{*}

李新兴¹, 蔡海龙^{2*}

(1.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目的] 中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 同时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和贸易大国。1949—2019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历经70年的风雨, 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通过回顾与总结农产品贸易发展历史, 为未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方法]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 运用详实的历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 将1949年以来农产品贸易发展史划分为3个阶段: 即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至入世前夕、入世至今。对应地, 农产品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角色被归纳为出口创汇、出口创汇与调剂余缺、优化资源配置与全面对外开放。文章着重探讨了各个阶段农产品贸易角色变迁的缘由、农产品贸易的特点。[结论] 回顾70年农业贸易发展历史, 中国农业贸易发展成就瞩目, 发展历程艰辛曲折, 中国现有农业贸易结构是发挥比较优势的产物, 未来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贸易的开展, 仍需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开展。

关键词 农业 出口创汇 调剂余缺 资源配置 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7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21[2021]01-0160-08

0 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比重虽然不及5%, 但贸易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延伸, 其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历程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70年农业贸易发展, 尽管历程艰难曲折, 但成就卓著。截止2018年, 中国农业贸易额达到2 168.10亿美元, 稳居世界第一, 70年来中国农业贸易不仅在“量”方面有了较大飞跃, 而且在“质”的方面有了极大提升。中国农业贸易的发展不仅有效的解决了自身的供需问题, 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回顾农业贸易发展历史, 总结农业贸易经验, 对于未来农业贸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关于中国农业贸易发展历史梳理的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3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关于贸易发展成就的总结。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多, 而且在内容方面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代表性文献有倪洪兴^[1]关于中国入世10周年农业对外贸易发展成就的讨论、牛盾^[2]关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业贸易发展成就的讨论、倪沙^[3]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成就的讨论以及薛荣久^[4]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外贸易发展成就的讨论。第二个模块是关于农业贸易政策调整目标、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演变特点、演变原因的探讨。其中, 代表性文献有黄季焜^[5]关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变迁的讨论、盛斌、魏方^[6]对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市场结构变动趋势以及变动原因的讨论、吝杰等^[7]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讨论。第三个模块则是对中国未来农业贸易调整方向。代表性文献包括薛荣久关于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主张, 吝杰等针对中国农产品进口以及杨中柱^[8]针对中国出口而提出的政策主张。

学者们对于农业贸易的发展成就、成就取得的原因以及展望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但对农业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有待探索。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产品贸易发展史的基础上, 根

收稿日期: 2019-08-05

作者简介: 李新兴(1989—), 男, 山东费县人, 博士生。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 蔡海龙(1982—), 男, 甘肃金昌人,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caihlmail@cau.edu.cn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大豆目标价格实施的福利变化和要素分配效应分析”(71503250)

据农产品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历史重大事件（1978年改革开放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该文将中国农产品贸易划分为3个阶段，即1949—1978年、1979—2001年和2002—2019年农产品贸易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被归纳为出口创汇、出口创汇与调剂余缺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与全面对外开放；最后就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贸易发展经验以及当前农业贸易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1 出口创汇:1949—1978年

1949年中国经济百废待兴，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党中央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在“基础弱、底子薄”的背景下，摆在中国面前的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建设资金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妥善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国内消费与贸易的关系等。在工业和服务业极度落后条件下，“牺牲”农业成为一项可行的选择^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以农产品为主的贸易状况。在中央确立计划经济体制以后，社会的各项经济建设均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为出发点，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资金，计划当局通过设置许可证、配额、限量登记等非关税措施严格控制商品进出口数量，对于部分商品实行指定公司经营的制度。鉴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可供贸易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等，这也就造就了建国初期以农（副）产品为主的贸易格局。

农产品“重出轻进”与非农产品“以进养出”的贸易政策下，农产品是产生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在许可证、配额、限量登记等措施下，农产品进口受到较大的抑制，1950—1953年农产品进口额在农产品贸易中的比重不足1/3^②。为了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计划当局也会通过削减国内消费以节约出的商品换取外汇，1954年7月陈云起草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关于各种商品国内市场销售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般方针，应当是国内市场的销售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出台以后，农产品进口额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占比进一步下滑，1955—1960年其占比已不足10%。“一五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工业品出口能力有所增强，1958年工业品出口比重超过农副产品，成为中国最主要出口产品，但在“以进养出”指导思想下^③，非农产品贸易长期存在贸易逆差。

3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农产品进口比重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针对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陈云建议中央从国外进口农产品以稳定市场，中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大幅增加了粮食进口。1961年粮食进口量猛增至5 809.7kt，较1960年增长了5 743.3kt，其后的4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维持在500万~600万t/年的水平。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大幅进口，也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轻视农产品进口的状况。

1966—1976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生巨大转变，贸易额连续多年年下滑，对外贸易有所衰弱。进入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外交关系掀开新的篇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也迎来春天，1973年中国货物贸易额突破100亿，1978年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06.4亿美元。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其发展速度更为迅猛，进出口贸易额由1972年的30.75亿美元增长至1978年的81.3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7.6%，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为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资金。

①1950—1953年农产品进口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6.4%、25.6%、15.0%和11.3%

②所谓“以进养出”是指通过进口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的贸易模式

表1 1950—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货物贸易总额	货物出口额	货物进口额	农产品贸易额	农产品出口额	农产品进口额	农产品净出口额	农产品出口与进口比	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农产品净创汇占比
1950	11.3	5.5	5.8	6.0	5.0	1.0	4.0	5.2	91.1	+
1955	31.4	14.1	17.3	11.6	10.5	1.1	9.5	9.8	74.6	+
1960	38.1	18.6	19.5	14.5	13.6	0.9	12.7	15.1	73.1	+
1965	42.5	22.3	20.2	22.1	15.4	6.8	8.6	2.3	69.0	+
1970	45.9	22.6	23.3	20.8	16.8	4.0	12.8	4.2	74.4	+
1975	147.5	72.6	74.9	55.1	44.1	10.9	33.2	4.0	60.8	+
1978	206.4	97.5	108.9	81.3	61.1	20.3	40.8	3.0	62.6	+
1980	381.4	181.2	200.2	129.5	88.2	41.3	46.9	2.1	48.7	+
1985	696.0	273.5	422.5	173.9	115.0	58.9	56.1	2.0	42.1	+
1990	1 154.4	620.9	533.5	192.3	106.5	85.8	20.7	1.2	17.2	23.65
1995	2 808.6	1 487.8	1 320.8	238.1	122.6	115.5	7.1	1.1	8.2	4.26
2000	4 743.0	2 492.0	2 250.9	268.5	156.2	112.3	43.9	1.4	6.2	18.21
2001	5 096.5	2 661.0	2 435.5	277.9	159.8	118.1	41.7	1.4	6.0	18.50
2005	14 219.0	7 619.5	6 599.5	562.9	275.8	287.1	-11.3	1.0	3.6	-
2010	29 727.6	15 779.3	13 948.3	1 219.6	494.1	725.5	-231.4	0.7	3.1	-
2015	39 586.4	22 765.7	16 820.7	1 875.6	706.8	1 168.8	-462.0	0.6	3.1	-
2018	46 230.4	24 874.0	21 356.4	2 168.1	797.1	1 371.0	-573.9	0.6	3.2	-

注：由于数据资料缺失，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援引孙东升（2001）^[10]研究成果。“+”代表农产品创造了当年全部贸易顺差，“-”代表农产品创造了当年全部贸易逆差

2 出口创汇与调剂余缺：1979—2001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较为缓慢，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5元，与1952年相比仅增长了266元，在对外贸易领域，尼古拉斯·R·拉迪^[11]指出，计划管理下的外贸体制几乎没有使中国参与二战以后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各项事业改革的序幕^[12]。1978年发轫于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很快被推广至全国。1958年提出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指导思想发生转变，粮食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水产、畜牧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农业生产发展不仅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②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优势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稳定的产品来源。

农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贸易领域政策的调整。为了顺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中央加快了外贸体制的调整步伐，包括简政放权，恢复了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③，并逐步扩大了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范围；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汇留成机制；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3]。改革与开放的政策红利下，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至2001，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达到5 096.5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23.69倍，此时，农产品贸易也获得快速发展，贸易额由1978年的81.3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01年的277.9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2.42倍。

①首先，贸易权被授予国有外贸公司即所属分公司，进出口业务严格依据指令性计划进行，企业自主权受到极大限制。其次，由于进口资金主要源于出口创汇，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相对单一，附加值比较低，有限的出口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进口能力

②该阶段，中央将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着重发展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建设（如交通、能源和材料）”

③1959年对外贸易部下发《关于简化对本部各进出口专业公司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手续的指示》和《关于执行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办法的综合指示》，提出各专业外贸公司以外贸部下达的货单或通知为进出口许可证，实行“以单代证”，这也就意味着许可证、汇率、价格、配额、关税等管理手段对贸易的影响已经无关紧要。而此时恢复进出口许可证，恰恰是中国逐步放弃外贸实物计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外贸环境的变化倒逼农业生产朝向比较优势产品发展。统购统销时期,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①,此后政府虽逐步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与国际价格相比仍存在一定的价差,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为农产品充分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对农产品生产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以蔬菜水果、畜产品与水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取代以粮食为代表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表2)。

表2 1980年、1990年和2001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变迁

	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农产品出口占比(%)		
	1980	1990	2001	1980	1990	2001
主要土地密集型	6.0	17.7	18.4	13.7	17.8	11.5
谷物	4.6	10.2	11.0	10.5	10.3	6.9
油籽	0.9	3.5	5.9	2.1	3.5	3.7
植物油	0.3	1.0	0.7	0.7	1.0	0.4
棉花	0.2	3.0	0.8	0.5	3.0	0.5
主要劳动密集型	11.3	49.8	99.9	25.9	50.2	62.2
蔬菜	1.4	5.9	23.7	3.2	5.9	14.8
水果	0.9	1.0	7.9	2.1	1.0	4.9
畜产品	5.4	27.6	26.6	12.4	27.8	16.6
水产品	3.6	15.3	41.7	8.2	15.4	26.0

注:表2中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主要为大宗农产品,包括谷物、油籽、棉花、植物油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为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下同。部分数据引用朱晶,李天祥、林大燕等研究成果^[14]。数据来源:1980年、1990年数据源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1979—1991》,2001年数据源于《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12》整理;表3同

农产品进口结构反映进口转型升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落实好“七五计划”关于“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政府逐步放宽了农产品进口限制,以小麦、稻谷、玉米为代表的粮食在农产品进口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由1992年的30.3%下降至2000年的4.6%,而反映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肉类、蔬菜水果、奶制品以及其他动物产品等产品进口则分别由1.7%、1.5%、1.2%和3.4%上升至6.8%、3.4%、1.8%和6.8%,油料作物(尤其是大豆)进口也因水产、牲畜养殖而得到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调剂余缺”的特点较为明显^[15](表3)。

表3 1980年、1990年和2001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变迁

	农产品进口额(亿美元)			农产品进口占比(%)		
	1980	1990	2001	1980	1990	2001
主要土地密集型	42.7	36.1	44.3	68.1	49.9	37.4
谷物	24.8	23.5	6.3	39.6	32.5	5.3
油籽	1.8	0.2	31.9	2.8	0.3	26.9
植物油	1.5	5.3	4.9	2.4	7.3	4.1
棉花	14.6	7.1	1.2	23.3	9.8	1.0
主要劳动密集型	0.7	3.2	51.1	1.2	4.5	43.1
蔬菜	0.5	0.8	1.1	0.8	2.0	0.3
水果	0.1	1.4	3.4	0.2	1.9	2.9
畜产品	0.1	1.0	27.9	0.2	1.4	23.5
水产品	0.1	1.0	18.7	0.2	1.4	15.8

①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鸭梨、柑橘和苹果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分别低79%、47%和41%,牛肉、猪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低84%、57%和54%

3 优化资源配置与全面对外开放:2002—2019年

回顾1949年至入世前夕经济发展史,资本与外汇短缺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垄断经营农产品的贸易政策虽然为维持农产品贸易顺差提供了保障,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16]。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产品消费大国,就中国南北水土资源配置不均、农业资源与环境承受巨大压力、农业后备资源不足的状况,优化资源配置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与贸易的必然选择。

3.1 “复关”与“入世”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中国就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GATT总干事提交了要求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照会,为了保证“复关”工作顺利开展,中国先后多次大幅下调了进口关税率^①,并逐步取消了部分非关税贸易壁垒。尽管中国在“复关”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阻挠,“复关”未能如期实现。

“复关”失败之后,中国开启了“入世”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履行“入世”承诺成为新时期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根据入世协议,入世过渡期后(入世之日起3年),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率将由入世之初的21%削减至15.8%^②。入世承诺中,中国的最高约束关税率为65%,同样也远远低于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国家(表4)。入世协议中,中国还承诺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为了避免非关税贸易壁垒关税化之后引起进口的过度减少,中国政府就小麦、大米、玉米、棉花、豆油、食糖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对于实施关税配额的商品,配额内关税率设定为1%~15%,配额外的关税率最高为65%。

表4 主要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 %

	中国	印度	日本	瑞士	挪威	欧盟	美国	巴西	阿根廷
平均	15.2	114	41.8	85	70.7	22.8	11.3	35.5	32
最高	65	300	170.6	1 909	1 062	408	440	55	35

注:资料来源:倪洪兴.开放条件下的农业贸易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17]

3.2 参与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建与区域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世界经济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加强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融入世界经济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就建成CAFTA达成共识,并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月“早期收获计划”(以农产品贸易为主要合作领域)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中国与东盟签署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以后,自贸区谈判与建设呈现加快趋势。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截止2019年6月中国已与24个国家(地区)签署了16项自由贸易协定(表5),此外,还有22项正处于谈判、研究之中。

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建同样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2013年中国开始探索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至福建、广东和天津3个地区,2016年又在辽宁、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和浙江7个地区试点,形成“1+3+7”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格局。

除自贸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建以外,中国还特别重视区域合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

①GATT的宗旨之一是削减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

②该税率仅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率的1/4,同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56%和发达经济体39%的平均关税水平

表5 中国双多边自贸区谈判进展

阶段	贸易伙伴
已经生效	东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智利、巴基斯坦、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台湾、瑞士、冰岛、澳大利亚、中国东,东盟(10+1)、韩国、格鲁吉亚、马尔代夫、智利(升级)、新加坡(升级)
正在谈判	RCEP、海合会、中日韩、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巴基斯坦(第二阶段)、新西兰(升级)、毛里求斯、摩尔多瓦、巴拿马、韩国(第二阶段)、巴勒斯坦、秘鲁(升级)
正在研究	哥伦比亚、斐济、尼泊尔、巴新、加拿大、孟加拉国、蒙古、瑞士(升级)

注: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印尼期间,先后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该设想一经提出便得到沿线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响应。现如今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8-19]。

通过加入WTO、筹建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不断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日益增强。2018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为2 168.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进口额为1 37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出口额为79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在强劲的国内需求与经济快速发展等多种因素作用下,自2004年中国开始由长期的农产品贸易顺差国转变为农产品逆差国,而且逆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在进口方面,油籽(含大豆)及植物油、棉花、谷物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较为迅猛,上述4类农产品进口额在农产品进口额中的占比由2001年的37.6%上升至2018年的42.4%。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呈现集中的态势:2001年中国农产品自前四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东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进口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56.5%,而至2018年,中国自前四大进口来源地(巴西、东盟、美国和欧盟)进口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比重上升至61%。伴随着进口规模的扩大,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大豆、棉花、食糖、天然橡胶等农产品最大的买家。进口大宗农产品相当于进口耕地与水资源,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得到相应的减缓^[5]。

出口方面,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是中国最为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上述3类农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45.5%增长至2018年的56.1%。就出口市场而言,2001年日本、欧盟、中国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是中国前四大出口市场,而2018年中国前四大出口市场演变为东盟、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欧盟,前四大出口市场的市场占比则由2001年的70.2%下降至59%,出口市场趋于多元化。

4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经验与总结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农业贸易实现巨大的历史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贸易额仅为6亿美元,而至2018年迅速增长至2 168.1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9.05%,高于同期8.10%的GDP增速,农业贸易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农业贸易在各个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农产品贸易承担着出口创汇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以后,在制度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农业生产也逐步向比较优势方向调整,农产品贸易除继续承担出口创汇功能以外,还发挥着“调剂余缺”的重要作用;复关以及入世谈判阶段,农业贸易承担了大量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减让承诺,其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筹码作用;入世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通过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合作与交流,对外开放水平快速提升,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能力明显增强;新时期,农业贸易在对外贸易中份额虽不足5%,但在满足国内供需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特殊的事件中(如中美贸易争端),农业贸易还曾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武器”。

伴随着国内外经贸环境的变化,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也发生明显变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土地、

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价格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这也为国家统制的管理制度下实现“出口创汇”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农业生产逐步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调整，蔬菜、水果、畜产、水产品以及园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农业贸易最为主要的出口产品，而以粮食（如大豆）为代表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进口产品。

在中国农业贸易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2004年中国农业贸易结束长期的贸易顺差进入贸易逆差时代，逆差额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部分大宗农产品进口激增的问题较为突出；进口多元化政策调整目标与进口集中度日益上升相背离；蔬菜水果、畜产品与水产品以及园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是中国最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但针对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事实，其出口优势呈现下滑趋势；此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水果等）已经转为净进口。总而言之，新阶段，中国农业贸易面临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未来农业贸易何去何从，仍需持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倪洪兴.开放条件下的农业贸易政策选择——入世10年思考与回望.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 [2] 牛盾.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三十年.农民日报, 2009-01-16 (002).
- [3] 倪沙.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8(12):32-40.
- [4] 薛荣久.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意义、作用与维护.国际贸易问题, 2018(10):1-15.
- [5] 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农业技术经济, 2018(3):4-15.
- [6] 盛斌, 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财贸经济, 2019(10):1-16.
- [7] 孙杰, 孟祥岩, 张璐璐, 等.我国农产品进口现状、问题及建议.经营与管理, 2019(8):80-82.
- [8] 杨中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创新发展研究.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3(6):7-11.
- [9] 陈锡文.读懂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 [10] 孙东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研究[博士论文].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1.
- [11] 尼古拉斯·R·拉迪:世界经济中的中国,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 1994.
- [12] 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 [13] 李计广, 王红梅, 张娟.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角色变迁和展望.国际贸易, 2018(7):4-10.
- [14] 朱晶, 李天祥, 林大燕.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问题挑战与政策选择.农业经济问题, 2018(12):19-32.
- [15] 王文涛, 肖琼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贸易从调剂余缺到适度进口的战略演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47(6):30-39.
- [16] 熊启泉, 邓家琼.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失衡:结构与态势.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0-68.
- [17] 倪洪兴.开放条件下的农业贸易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 [18] 李全中.“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农业对外发展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6):23-27.
- [19] 安晓宁, 辛岭.中国与东南亚农产品贸易现状与潜力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118-127.

THE CHANGING ROL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FROM 1949 TO 2019*

Li Xinxing¹, Cai Hailong²✉

(1. Nation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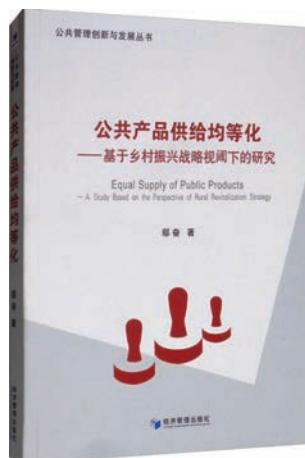
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produc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 major consum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 major trading country. From 1949 to 2019,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d traded for 70 years, and it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view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use of detail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and taking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s the node,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v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ve of WTO accession, and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Correspondingly, the main role of agricultural trad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ummarized as export earning, export earning and adjustment of surplu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t various stag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trade. In conclusion,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we can see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d arduous and tortuous develop road.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current agricultural trade structure is the result of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trade in the future still ne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agriculture;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through export; regulating surplus and defici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opening up

·书评·

基于公共关系理论的乡村治理创新思考 ——评《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的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重要且特殊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我国8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稳定发展。近些年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9.6%，城市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振兴，但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矛盾，城乡公共产品的不均等化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该问题，福州师范大学鄢奋教授著作了《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的研究》一书，书中给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现实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更好的完成乡村治理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全书由5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第一编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第二编城市公共产品供给非均等化的现状和原因、第三编应明晰的关系和经验借鉴、第四编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的实现路径。作者从公共产品供给的核心理论出发，通过历史发展、公共决策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公共产品非均等化的成因。全书集高品位与可读性于一体，将难懂的专业术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对开展乡村治理有很大帮助。

我国古代乡村主要是乡绅治理，当时“皇权”不下县，乡村是比较分化和分散的，乡村公共产品几乎无供给，其乡村治理以“自治”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起波澜壮阔的社会建设，党和政府开始深入乡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自治”与“行政”相结合并持续创新之路。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政府更加重视乡村的公共管理服务，乡村治理的大幕逐渐拉开。政府不断更新理念、转变观念，赋予乡村政府新的权力关系，意在建立既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又有各个主体自愿接受的非正式约束，既有政府的强制管理，又有各团体间的民主协商、村民参与政策决策的全新的治理方式。

(下转第196页)